



编辑论丛 3

辽宁大学出版社

润物集

于成全 著

昨日的辉煌

——序《润物集》

宝 藏

成全兄台的文学评论选《润物集》即将付梓。一叠叠参差错落的复印稿，钳住了我的目光；一篇篇不同时期的文章，搅动了我的思绪。悠悠岁月，历历往事。我又在文学批评的风景线上，重睹了昨日的辉煌。

我了解成全，也了解这些文章。

——这字里行间，淙淙有声，曾经流走了逝水的年华；

——这一个个脚印，深深凹陷，踩下了沉重的思索；

——这一簇簇理论的火花，熠熠灼目，闪烁着思辨的光华；

——这一只只留在海滩上的贝壳，斑斑陈迹，犹可谛听当年激荡的潮声；

——这一张张挂在枝头的红叶，飘飘焕采，浓染着生命秋天的颜色。

我陷入了沉思。

从1979年1月到1983年末，我和成全同在中国

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创作研究室工作。当时，作家协会刚刚恢复不久，文学艺术像渡过严冬的春草重新抽出新芽。在古老的大帅府里，我们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岁月。如今回顾，可以告慰的是，我们那种真诚的投入作为历史合力的一部分，曾经作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车轮的发轫。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会议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个会议果断地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合时宜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这个会议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个会议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对“四人帮”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升腾起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曙光。

会后，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马加同志多次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协会的文学工作。创作研究室负责人陈言同志，组织室内五名同志，反复讨论国内、省内的文学形势，确定工作方向。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在文艺领域里拨乱反正，我们的行动指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使用的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

家首先一致地把目光集中在“大连小说会议”上，——196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全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同志针对当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后来竟被罗织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早在1964年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伙同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又把它作为修正主义文艺代表性的论点，反反复复地进行围剿，流毒播布十分深广。——这无疑是全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大家查阅了大连小说会议的原始材料，又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谓的“批判文章”，可以不愧地说“工程浩大”，最后大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要抓住这个关键，我们要面向全国发言。于成全和李作祥先后写出《“现实主义深化”是正确的文学主张》、《关于所谓“写中间人物”问题》，发表在《鸭绿江》上；同时我和杨成谦写出《发扬艺术民主，按艺术规律办事——重评“大连小说会议”》，发表在《辽宁日报》上。这些文章在全国是破天荒地为“大连小说会议”公开辩白，是在文学领域里破开冻土的第一犁，是关系中国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的一举，《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分别予以转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文章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上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

以后，创作研究室工作又进一步深入到省内的创作研究。1979年末，我和成全共同写出了《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评辽宁1979年短篇小说创作》。当

时,辽宁文艺界已经捣毁了“四人帮”所推行的“阴谋文艺”,扫荡了“瞒”和“骗”的虚假文风,破除了“三突出”、“高大全”的创作模式,开始向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回归,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为了准确地把握辽宁的创作状况,我们阅读了省内各种文学期刊,特别是对韶华、金河、熙高、达理四位有成就的作家,我们研究了他们当年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的作品。这篇评论文章,纵览了辽宁短篇小说创作形势,又重点分析了几位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它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全省小说创作的综合评论。相继,创作研究室的同志又分工研究省内重点作家,成全研究韶华,作祥研究达理,我研究马加,作为个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与此同时,每人还要关注省内的新人新作,审视全省暨各市地的创作发展形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全在诗人刘镇从河南返回辽宁不久,就及时地写出了《经过生活磨炼之后——读刘镇 1981 年的诗》;在迟松年连续创作出轰动的作品之后,又热情地写出了《着力表现人的精神美——读迟松年近期的几个短篇》;当初学文、晨哥等青年作者有新作问世的时候,他也都予以真诚的关注;他曾特别观照过营口地区的创作,写出《可喜的收获——读〈辽河〉1980 年的短篇小说》;他还针对创作形势发表自己的意见,写出《努力表现改革者的精神风貌》、《着力表现农村青年一代形象》、《文艺创作与赶时髦》等等。回头来看,当年创作研究室工作扎实,成绩卓著,而成全个人贡献也是突出的。

于此,我不禁感慨系之。近年来,看到两本反映辽

宁文学状况的书：一是《辽宁文学十年·评论卷》，可谓作者众多，篇幅浩繁，但不知为什么在全国文艺界拔乱反正的舞台上辽宁评论家捷足先登为中国作协“大连小说会议”辩白且产生巨大影响又被《新华文摘》选入的文章竟没有入选。试问该书偌多文章曾有几篇被《新华文摘》摘编？能有几篇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据如此之地位？这不能不使人产生遗珠之憾！相继，又看到《1940—1990 辽宁文学概述》，书中对一首小诗、一篇短文尽可嘞嘞不休，而对辽宁评论家为中国作协“大连小说会议”辩白的重大事件却一笔带过，把作协专职研究机构创作研究室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对省内创作形势的研究、作家专题研究，统统“概”掉。最不幸的是成全，甚至在许多评论家列传（且不论立传者是否允当）之后，“还有”里也不见“于成全”的名字。成全在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任教务长默默工作达十年之久，该中心培养全国各地学员近 30 万人次，全国第四次作代会的工作报告中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为此成全获得了全国文学期刊函授编辑人梯奖，这一切也只字未提。噫嘻！皇天后土，实当共鉴，其瞽矣哉！其昏矣哉！

毋庸讳言，成全的文章大都是讲求功利的。他具有评论家崇高的使命感，强调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关心创作的发展，注重文学的效益。他使用的批评方法是社会学的批评方法。

文学要不要讲功利？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社会主义文学属性规定了它的功利性。但是，几年前，以至现

在，都有些貌似清高的评论家、文学家耻言功利，认为艺术与功利是对立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那不行，“二者不可得兼”。还有这样的文学筵席——吃鱼，就不能吃熊掌？文学有了功利，就没有了艺术；哪个评论家谈了功利，就耻笑你不懂艺术。他们翘首望天，目空一切，回过头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则连连摇头，不屑一顾；甚至谈到鲁迅，谈到茅盾，谈到艾青，也不禁鄙夷，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巨匠也都嗤之以鼻了，大有中国文坛“舍我其谁”的架势。其实，中国的文学与批评，从来就讲功利。诗经三百篇，“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后历代，无不推崇“文以载道”；直到文学研究会，也还明确主张“为社会为人生”；更不用说我们的文艺方向规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所“为”本身就标明了功利。现代派文学又何尝不讲功利？翻一翻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就是非常讲功利的。现代派文学巨擘福克纳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中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说：作家“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现今中国已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一切都可以化为商品，一切都可以进入市场。文学作品急速商品化，膜拜孔方的作家不乏其人。千方百计地为作品作广告，处心积虑地迎合世俗，寡廉鲜耻地推销自己，真可谓“利欲驱人万火牛”。为了追求高利，文学作品已经进入深圳拍卖行，面对这种物欲横流的现实，不知自诩

清高、高谈艺术、不言功利的评论家、文学家该作何感想？功利总是要讲的。古代讲，现代也讲；中国讲，外国也讲。只不过功利有高下之分：为社会、为人民、为人类的功利，那是高尚的；为个人、为哥儿们、为小团体的功利，那是卑下的。

成全并非评论之翹楚，他的文章也并非尽是黄钟大吕。但他及其同时期的理论家在评论中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对社会的责任心，对人民的文学地位的关注，对时代精神的弘扬，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忠诚，是弥足珍贵的。特别在个人主义膨胀、拜金主义盛行的现实中，在“世纪末文学”的氛围里，它已经是鲁殿灵光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的话很深刻地道出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文学嬗变的客观规律。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悄然兴起，一种旧的文学思潮渐趋式微，都有其时代的内在机制。

70年代，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像大海一样愤怒，评论家鼓吹作家做人民的代言人，打破创作禁区，破除“阴谋文艺”的创作模式，恢复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鼓励作家揭露“四人帮”的罪恶，创作“伤痕文学”，这在当时实在是势所必然。80年代，人们冷静下来，痛定思痛，发掘人民受难的原因，寻求济世良方，进而创作出“反思文学”，这本也顺理成章。国家要发展，社会要改革，评论家呼唤大刀阔斧变革现实的人物，作家们热情地投身到生活的旋涡中去，于是，“改革文学”也就应运而生。应该承认，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坚持现实

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也是必然的。事实也已证明，新时期初叶的文学发展是健康的，富有朝气的，作家和人民的关系是和谐的，文学对现实的作用是积极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藐视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评论家，鄙薄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评论。出现这样的创作与批评，乃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有些人一提起新时期初叶的文学创作，就觉得低级、肤浅，不可登大雅之堂；提到那时的理论批评，就觉得陈旧、保守，卑之无甚高论。这不足为怪——脱离历史的环境与条件，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没有切身的体验与感受，“夏虫不可以语冰”。

试想，在人民大悲大恸大愤大怒的时候，如不与人民同仇敌忾，反而鼓吹同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张扬人道主义，倡导写人性、写人类之爱、写身边琐事，岂不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试想，在那个时候，如过早运用外国的艺术手法，弄些隐喻、象征、梦境，打破时空，淡化情节，搞魔幻现实主义，玩博尔赫斯的叙述圈套……这一切群众看不懂，人民的悲愤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宣泄。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我并非一概否定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更不反对文学向本体回归，不反对吸收外国的艺术手法。只是要表明这样的见解：一、历史早走一步，多走一步，都会变成谬误。二、对新时期初叶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应该历史地进行公正的评价，不应该抱有轻蔑的态度。

当然，我也不愿隐蔽自己的观点。对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一直不敢恭维。他们胶柱鼓瑟，实在没有弹出什么好的曲子；他们炫玉贾石，倒是兜售了一些假冒伪劣商品。时至今日，据某些敏感的分析判断，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世纪末文学”了，摒弃理想，亵渎神圣，蔑视道德，创作与评论江河日下，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绝望和颓废。一蟹不如一蟹了。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先前未有过的悲凉。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话不必多说，一切交给历史。历史未必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成全文学评论选集编定，春节前嘱我写些文字。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故不揣浅陋，略陈旧事，亦抒感慨，以酬友情。是聊为序。

1994年春节于藏宝斋

目 录

昨日的辉煌	宝 藏
——序《润物集》	
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	(1)
——评辽宁 1979 年短篇小说创作	
“现实主义深化”是正确的文学主张	(23)
——为大连小说会议辩白	
关于“写中间人物”问题	(33)
——为大连小说会议再辩白	
经过生活磨炼之后	(42)
——读刘镇 1981 年的诗	
着力表现人的精神美	(51)
——读迟松年近期的几个短篇	
与社会脉搏一起跳动	(57)
——谈韶华的创作	
可喜的收获	(71)
——读《辽河》1980 年的短篇小说	
着力表现农村青年一代形象	(80)
——读初学文中篇小说《流水淙淙的夏河湾》	
“神灵”不灵	(85)
——读短篇小说《图腾之死》	

努力表现改革者的精神风采	(90)
——读小说《小孟和老孟》	
文艺创作和“赶时髦”	(94)
开拓一条文学青年自学成才之路	(98)
——《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六年工作	
写人要写“心”	(113)
——评析《就这件事……》	
附：《就这件事……》	(117)
读《深藏在心底里的爱》	(123)
附：《深藏在心底里的爱》	(127)
提出问题应该回答	(135)
——小说《78 号房间》读后	
附：《78 号房间》	(139)
以小见大	(150)
——读小说《“灶爷”买牙刷》	
附：《“灶爷”买牙刷》	(152)
情节重复的魅力	(158)
——读小说《夜声》	
附：《夜声》	(161)
简谈《修墙》	(165)
附：《修墙》	(167)
后记	(171)

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

——评辽宁 1979 年短篇小说创作

过去的 1979 年,是我省短篇小说创作活跃的一年,繁荣的一年,发展的一年。

从省内文艺刊物《鸭绿江》、《春风》、《芒种》、《海燕》以及省外报刊发表我省作者的短篇小说来看,这些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性上,较之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有了迅速的提高,较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也有明显的突破。一切表明,我省的短篇小说创作正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我省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是和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1978 年,全国范围内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文艺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它像火炬一样照亮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它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1979 年我省短篇小说创作就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繁荣起来的。如果没

有思想解放，文艺工作者就不可能砸烂“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冲破极左思潮的思想羁绊，摆脱艺术创作中的清规戒律；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文艺工作者就不可能去表现那样富有战斗性的主题，反映那样丰富多采的生活，塑造那样有血有肉的人物。只因为有春天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和顺的风雨，才有这短篇小说创作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不看到这一切，就没有起码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

近一年来，我省短篇小说作品反映的生活是丰富的。从内容上看，大体可以分四类：一类是侧重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生活，揭露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描写善良的人们艰难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如《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虔诚》（《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舌头》（《鸭绿江》1979年第6期）、《信念》（《鸭绿江》1979年第11期）、《白描》、《闭不上的眼睛》、《疯姑娘》、《我的老伴》（《春风》1979年第1期）、《幽思》（《鸭绿江》1979年第3期）、《分道扬镳》（《鸭绿江》1980年第1期）、《生产队长范子明》、《素不相识的人》（《春风》1979年第2期）、《东山霜叶》（《芒种》1979年第2期）、《又是一代人》（《海燕》1979年第2期）等便是。再一类是反映粉碎“四人帮”后几年来的现实生活。其中有的作品讴歌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新事，如《一矿之长》（《鸭绿江》1979年第1期）、《上访者》（《鸭绿江》1979年第4期）、《矿大嫂》（《辽宁日报》1978年12月10日）、《不打不成交》（《芒种》1979年第1期）、《扎红腿带的鸡》（《鸭绿

江》1979年第6期)、《特别约会》(《鸭绿江》1979年第1期)等便是;其中有的作品抨击“四化”的阻力,如《约法三章》(《春风》1979年第2期)、《在初春的日子里》(《鸭绿江》1979年第6期)等便是。还有一类比较注意反映社会问题,即所谓“问题小说”,如《你要小心》(《十月》1979年第1期)、《失律的心》(《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辞职》(《春风》1979年第2期)、《忧喜相伴》(《鸭绿江》1979年第3期)、《招魂曲》(《鸭绿江》1980年第1期)等便是。最后一类反映中国人民与友好国家人民的友谊,如《来自西半球的客人》、《生日》(《春风》1979年第1期)等便是。这几类作品,基本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十年浩劫和粉碎“四人帮”后几年来斗争生活的重要方面。

从近一年来发表的作品来看,我省的短篇小说创作恢复并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四人帮”横行十年,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心灵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国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历史出现了空前的倒退。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们怀着满腔的义愤,写出了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人们读了金河的《重逢》,都不会忘记红卫兵小将叶辉。他本是工人的儿子、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只有十七、八岁,一些人起来揪校长斗老师,他气得直哭,一度当过“保皇派”。后来去北京,他觉得受到了“最大最大的教育”,决心起来造反,为捍卫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在这“可爱的动机”支配下,他参加了跟“老保儿们”的武斗,亲手用长矛把一

名同学刺死，把一名工人打伤致残，最后成了“打砸抢的首恶分子”。这仅仅是一个小将在犯罪吗？不。叶辉前后的变化，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谬误。达理的《虔诚》，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清队运动中的一桩典型的冤案展示给读者：老矿工何玉忠过去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罢工斗争，并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可是30年后，他却无端地被打成了“工贼”、“历史反革命”，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毛主席制定的”中央文件，就必须按照“不是也得是”的准则来办事。结果，何玉忠违心地承担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遭到了批斗，开除了党籍，还要遣送下乡。他在哭诉无门的痛苦中，跑到了就要“回柱”的坑道里，在“落顶”时毁灭了自己。这哪里是老矿工自杀？分明是“四人帮”推行的现代迷信在杀人。韶华《舌头》中的许梦启，心直性耿，嘴大舌敞，因说真话，屡遭横祸，最后只觉得“千错，万错，都怪我长个舌头！”于是在气恼之下，用刮脸刀片把舌头割了下来。这是多么凄惨的人间悲剧呵！刘镗《闭不上的眼睛》中的老梁太太，30多岁开始守寡，她象男人一样劳动，给三个儿子办了婚事，但到年迈时却没人为她养老送终，她为求活命，种了八棵桃树，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非砍掉不可。她没有出路，只好上吊自杀。这是怎样的世道，怎样的人生！三好学生变成了杀人犯，老革命者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正直人的舌头成了祸根，孤独的老人要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而不可得：这就是“四人帮”横行时阴阳易位、乾坤逆转的社会现实。随着生活的发展，斗争的深入，革命的文

艺工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地反映“四人帮”的罪恶，表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创伤，他们逐渐从激愤中冷静下来，深入思索和挖掘产生这种罪恶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又进一步通过艺术形象去表现历史的教训，提出社会中的实际问题。韶华的《你要小心》就尖锐地提出了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它告诉人们，要特别警惕那种溜须拍马、挑拨离间、乘隙整人、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不能让他们钻进各级领导班子。李云德的《忧喜相伴》揭示了国家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办事拖沓这样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熙高的《招魂曲》提出了当今社会一部分人出现“信仰危机”这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作家们用现实主义的解剖刀，解剖生活，揭出病症，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并进而改造生活。与此同时，四化的斗争生活也更鼓起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熙高的《一矿之长》，比较及时地反映了“四化”进程中的矛盾斗争，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战斗在四化第一线上的领导干部丁海川的形象。金河的《扎红腿带的鸡》写了街道基层干部刘大妈密切联系群众，协助工人家属搞好后勤工作的故事。这些短篇小说，坚持从生活出发，控诉了“四人帮”的罪恶，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愿望，反映了向“四化”进军的火热现实。基本上写出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描绘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画面。

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这一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早在20年代就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因此也生出瞒和骗的